

不朽之光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一本小說在英國網絡社交平台上突然走紅，讀者們爭相上傳手拿小說的自拍照，讓人有些摸不着頭腦。

該書是十九世紀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於一八四八年發表的《白夜》，以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夏季為背景，當時的夜晚被稱為「白夜」。書中講述女主人公愛上一個年輕的房客，兩人約定一年後在聖彼得堡的一座橋上相會，可房客沒按時露面，讓姑娘有點失望，但信心依舊。而孤獨又愛幻想的男主人公，被姑娘的深情打動，便接連四個晚上陪伴她在河邊等候。最後房客終於出現，男主人公壓下對姑娘的愛慕之情，為他們送上祝福。雖然這份感情沒有修成正果，瞬間心與心的碰撞卻成了永恆。

就是這部波瀾不驚又透露着濃厚抒情氣息的小說，一夜間成為西方網絡熱門讀物。#Dostoevsky標籤在TikTok上有超過三千四百萬條帖子，在BookTok、Bookstagram等平台上搜尋這本書，會出現一頁又一頁的熱情評論、帶註釋的副本以及疊加在喜怒哀樂鏡頭上的引言。甚至還有以《白夜》為靈感的Spotify播放列表，其中充滿了柴可夫斯基和蕭斯塔科維奇等作曲家的歌曲，讓讀者完全沉

浸在故事的憂鬱之中。據統計，企鵝公司經典版《白夜》一度躍升英國第四大暢銷翻譯文學作品，僅倫敦老牌書店Hatchards就售出數百本，以寫於一百七十多年前的古典文學來說，能賣出這個成績，堪稱「現象級」。

為何《白夜》能引起讀者如此大的關注呢？最直接的一個原因是它的篇幅較短，只有八十頁左右，極符合網絡時代求簡求快的特點。用媒體評論的話說，在BookTok上，許多讀者會使用Goodreads等跟蹤平台，為自己設定每年要讀完的書目，像《白夜》這樣簡短的書籍通常很有吸引力，它可以讓人們輕鬆地完成年度閱讀目標。與此同時，俄羅斯古典文學博大精深，而《白夜》簡單宜讀，是理想的入門讀物。

當然，最打動人心的還是故事本身。讀者除了聚焦男女主人公的朦朧愛情，還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的孤獨和自我幻想產生強烈共鳴。套用網上一篇熱門帖文，「在讀這本書之前，每個人都想墜入愛河，都自以為懂得了愛情，直到讀了《白夜。」言外之意，如同一位網民所說，「這本書捕捉了那些有幻想的人，他們自以為比其他人更優秀，實際上卻活在自己的世界裏。」在BookTok上，很多人患

上把自己視為虛構故事中人物的「主角綜合症」，對《白夜》折射的疏離、渴望和孤獨主題大力點讚。

有英國學者指出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《白夜》時，他捕捉到了聖彼得堡夏季短暫的光輝——在這個季節，黑夜與白天幾乎無法區分，情緒就像陰影一樣模糊和延伸。這是一個關於轉瞬即逝的連結、單戀和對遙不可及事物渴望的故事，年輕讀者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憂鬱故事，變成了他們自己午夜懺悔的讚歌，經常將引言與音樂搭配起來，還有那些被雨水浸透的街道和黃昏的城市景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據《福布斯》的調查，十六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比其他任何年齡層的人都感到孤獨，百分之七十三的Z世代尤其如此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Z世代偏愛《白夜》。事實上，許多古老的讀物可以透過梳理，來找到與現代的相似之處。比如《白夜》中對轉瞬即逝的親密關係的描述，讓人感覺非常熟悉，這是被人看到卻又被遺忘的心碎。用今天的網絡語言來說，就像在一個約會應用程式上瀏覽、停留並隨意滑動一樣。

除此之外，《白夜》與近年來在年輕人中流行的小說子類型「黑暗浪漫」頗為相似。這

類小說通常在迷戀和不適之間徘徊，深入探討人際關係的陰暗深處，將愛與背叛、創傷和救贖交織在一起。它的人物道德模稜兩可，故事情節高風險，與傳統的愛情故事截然不同。對讀者來說，這不是田園詩般的浪漫，而是對情感傷痕發自內心的、有時令人不安的探索，在翻過最後一頁後，這些傷痕仍然揮之不去。

正如黑暗浪漫主義起源於哥德文學一樣，黑暗學術界也大量借鑒唐娜·塔特的《秘史》、瑪麗·雪萊的《科學怪人》，甚至艾略特的詩等經典作品，不僅將這些老作品復活，並把它們嵌入現代語境中，同時還擁抱它們的孤立、野心和道德模糊性的主題。因此雪萊對傲慢的探索和艾略特對時間和衰敗的沉思特別引起共鳴，在尋求深度參與藝術和文學的年輕讀者中找到了新生命。正基於此，讓《白夜》在跨越一個半世紀之後，仍散發不朽的光芒。

可以想見，那些創造了「brainrot」（腦腐）和「skibidi」（馬桶人）等流行詞語的Z世代，有理由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達難以言喻事物的能力所吸引，畢竟幻想家的旅程不是勝利的旅程，而是自我發現的旅程。

傅斯年



白話文人物志
李春陽

傅斯年十三歲時被送至天津府立中學堂讀書，接受新式教育，一度住在《大公報》創始人英斂之家中。一九一九年「五四運動」爆發，傅斯年成為學生領袖。同年投考山東省官費留學資格，遠赴英倫、德國，留學七年而未獲學位。

一九二八年傅斯年發起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它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專業的歷史研究機構。他的「史語所」（中研院下屬十三個所裏成最大的一個）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將那個時代一流的學者集合在一起，這些學者包括中古史學家陳寅恪、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、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。傅斯年做事的能力很強，鄧廣銘曾說，沒有傅孟真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。

傅斯年有句名言，「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」，他將原始資料的重要凸顯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還強調拓寬歷史資料的範圍，打破了過去對於書面資料的迷戀。他把「史語所」按照研究對象的不同分成八個組：史料學、漢語、文籍考訂、民間文藝、漢字、考古學、人類學及民俗學、敦煌材料研究。

一九三七年日軍佔領北平。北大、清華和天津的南開大學合併，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提議，也出自於傅斯年。這所大學成為戰爭年代中國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，培養出了傑出的人

才。史學家何茲全曾說，傅先生囑我兩句話，「一定要學好古文，一定要學好外語。」傅斯年批評當時的中國教育未能擺脫培養士大夫——文人的模式，沒有能訓練出學有專長的專業人士。他曾說，「一成『文人』，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。」他對傳統的士大夫文化抱有很深的敵意。這一點他與陳寅恪有很大的分歧。

傅斯年從一開始就是白話文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和有力幹將，他有許多文章涉及於此。《文學革新申議》、《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》、《怎樣做白話文》、《文言合一草議》等，產生過較大的影響，他主張「取白話為素質，而以文詞所特有者補其未有」，有志於創立「一部文言合一的修詞學」。

傅斯年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麼東方、西方之分，他向來不用什麼東方文化、西方文化這樣的名詞，他認為真理只有一個。他曾明確表示要「將歐洲的歷史作我們的歷史，歐洲的遺傳作我們的遺傳，歐洲的心術作我們的心術。」

一九四九年他擔任台灣大學校長，自覺地接過了蔡元培校長當年手裏的火炬，作為北大傑出的畢業生，一位曾經的「五四青年」，他將自己的影響力和辦學理念永久地留給了這所大學。

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，傅斯年曾應邀對延安做了五天的訪問。臨別毛澤東題寫唐人詠史七絕相贈，「竹帛煙銷帝業虛，關河空鎖祖龍居。坑灰未冷山東亂，劉項原來不讀書。」

(二十四)

昨日書：詩歌和洞背村



茶畫會
綠茶

洞背村，深圳大鵬新區東部一個小山村，依山傍海，山是馬巒山，海是小梅沙，山海之間有一條小眾徒步小道。小村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，吸引了很多文藝界人士來此聚居，詩人、作家、攝影師、設計師等等，詩人黃燦然、孫文波和作家周慧就是洞背村的「老村民」。

二〇一四年，詩人黃燦然辭去《大公報》二十多年的夜班翻譯工作，帶著幾十箱書從香港遷居到深圳洞背村，過起了養狗、喝咖啡、聽交響樂、爬山的鄉居生活，而寫詩和譯詩成了他洞背生活的重心。

洞背的日常生活，環繞在他的肉體和心靈四周，贈予他密林、雲霧和大海。從都市到鄉村，從新聞翻譯到文學翻譯，新鮮的洞背給了他全新的創作源泉，他沒有改變寫作方法，而是從個人細節出發，書寫對於周圍環境的本能反應。他把自己在洞背村二〇一四至二〇一六年間寫的詩結為《洞背集》，收錄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《黃燦然的詩》中。

剛剛到深圳那一年，黃燦然翻譯的布羅茨基作品《小於一》獲得深圳讀書月二〇一四年度十大好書，我恰是評委，見證了評委們對這本書高度一致的認可。各路媒體記者紛紛深入洞背村，採訪這位「隱居」的譯者。雖然《小於一》不是黃燦然到洞背村後翻譯的，但住在洞背村的八年，他先後又翻譯了布羅茨基、曼德爾施塔姆、勒內·夏爾、希尼、阿巴斯、布萊希特、米沃什、保羅·策蘭等大詩人的作品。

一同住在洞背村的還有詩人孫文波，他比黃燦然早來半年，他們保持着適度的安靜，又不缺乏社交。經常有外地作家、詩人朋友來洞背看他們。多多、王寅、宋琳、葉輝、劉立杆、胡續冬都曾來過洞背村。設計師金瓊的小院裏擺着長條桌椅，有時十幾個詩人坐在那裏聊詩歌和文學，不經意就到了凌晨

三四點。

也是二〇一四年，四十歲的周慧辭了職，從深圳市區搬到了洞背村，和黃燦然、孫文波等人成了鄰居。十七歲高中畢業後，在工廠縫過鞋跟、裝過手錶機芯，後來考上大專，在深圳工作了十幾年。她厭倦了日復一日人事經理的工作，決定換一種生活方式。

在洞背村，她過上了匱乏但也豐富、自在的無業生活，不想做任何事，沒有社會角色，沒有責任要扛，不需要認可，也無處賣弄。她眺望着山和海、村莊和故人、遠逝的青春和身處的中年。看書、發呆、記錄，沒有虛榮和功利，感受則漸漸豐富起來，有時多到要溢出來，就寫點兒東西。黃燦然看到她寫的東西，鼓勵她，「寫得不錯，好好寫，將來說不定能出一本書」。二〇二四年二月，她的散文集《認識我的人慢慢忘了我》出版。

編者黃燦然寫道：「你可以把這部書看作一個湖南農村小姑娘一路成長，然後來到深圳拚搏，終於成功了的故事，只不過這成功不是變成大公司女掌門，而是變成一個女作家，她的拚搏是拚搏着不去拚搏，終於贏得沒有財富的自由，過上使貧窮微不足道的生活。」

如今，黃燦然和孫文波都已經離開洞背村。

有人離開，有人到來。

九〇後男生忽忽和女生賓波也被這

片山海吸引，來到洞背村，開了一家小書店叫「昨日書」，書店就開在黃燦然、孫文波經常聚會的設計師金瓊的小院，洞背舊村三十三號院。

忽忽曾在北京一家出版公司做編輯，後來回湖北老家工作。洞背和他，似乎八竿子打不着。然而，緣分這事誰能說得清，他在《在城市的邊緣，開一家小書店》中寫道：

「dongbei，兩個四聲，第一次聽到，彷彿兩個圓圓的石頭滾了下來。那時我對它毫無了解，後來發現，幾乎身邊每一個朋友都知道，原來就是《日常的奇跡》裏黃燦然的洞背。洞背的好，黃老師詩裏寫過，孫文波老師也寫過，周慧（蛋蛋）在今年出版的《認識我的人慢慢忘了我》寫得更多。」

於是，他們義無反顧地來了，在「昨日書」紅書主頁，他們寫道：

「五月，來到這座城市的這個角落，喜歡上了，連着幾天半夜睡不着覺，在無人的村裏街道暴走，以雙腳丈量這個小村子，迫切想弄明白它的角角落落，有幾分害怕，也有幾分興奮。

六月，等了好久，從開年就糾纏在這座城市的雨霧終於過去，我們再訪洞背，確定來這裏生活。

七月，將所有的東西，書籍由物流寄過來，其他東西開車載過來，拿了駕照沒開過一千公里，因為相信『力由心生』，相信自己可以做到，於是就真的自駕開一千公里來到這個人生中的第二個鄉村……

到了十月，這座村莊依然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物，但它已成了我的第二故鄉，似乎可以化身為一條小溪，自在流動。隨意走走，看看村裏的老人在幹什麼，走累了就回到店裏，翻翻書，來一杯手沖咖啡，或是在大樹下打一會盹。」

店名取自忽忽曾經任職的出版公司出品的馬世芳作品《昨日書》，源自鮑勃·迪倫的《My Back Pages》：Ah,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/I'm younger than that now（啊，但昔日的我如此衰老，而今的我風華正茂）。

是啊，衰老的洞背舊村，如今風華正茂。因為文學、因為詩歌，以及昨日書裏的日常。



「太陽人」石刻



「極目楚天——湖北歷史文化陳列」正在湖北省博物館舉行。該展覽匯聚一萬六千件珍貴展品，涵蓋文化、藝術等多個領域，其中不乏眾多首次亮相的稀世珍品，全面展示荆楚地區的發展脈絡與卓越成就。圖為觀眾在參觀「太陽人」石刻。

新華社



市井萬象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聖誕假期，在內地戲院看了期待已久的《小小的我》。

這部關注腦癱青年成長的電影，在第三十七屆東京國際電影節奪得「觀眾選擇獎」。易烊千璽飾演二十歲腦癱青年劉春和，在劇中貢獻了讓人印象深刻的演技，而劇中男主角與外婆（林曉傑飾）和母親（蔣勤勤飾）相處的故事，其間的困頓也好，溫馨歡愉逗趣也罷，都賺足觀眾眼淚。

關注殘障人士的電影本就不多，聚焦腦癱青少年的更是少之又少。入場觀看這電影之前，我對於腦癱患者知之甚少。腦癱並不是傻子，他們可以讀大學考駕照，甚至可以擁有愛情並組建自己的家庭，劇中男主角劉春和用不懈的努力，不斷打破外界對於殘障

人士的偏見和成見，讓他和像他一樣的人們被看見、被認可。春和在應聘培訓學校老師時引用袁枚的那句「苔花如米小，也學牡丹開」，正是借物喻人。

電影並未用同情或憐憫的語氣來講述劉春和的故事。片中絕少刻意煽情，而是用平視鏡頭記錄柴米油鹽的細瑣生活，從一餐飯到一次面試，從公園的邂逅到車站的偶遇，沒有大開大合的劇情，尋常中反而別具溫情。遠道而來的外婆是影片的一大亮點，她年輕時候生猛、不服輸，老了也是幽默的、享受生活的老太太，和一幫愛熱鬧的老年人成立合唱團，到處找機會演出，又時不時拌嘴爭鬧，生命力極旺盛。蔣勤勤飾演的媽媽則活得壓抑，不自覺將壓力轉移到對於殘障兒子的培養上。她苛刻地要求劉春和必須復讀考本市的大學，不能談戀愛，不能浪費時間和合唱團老頭老太混在一起學

苔花也學牡丹開

打鼓；外婆呢，才不管這些，她鼓勵外孫勇敢追求夢想、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像她當年那樣。

這電影初看是希望社會像對待普通人那樣對待腦癱人士，給他們信心和尊嚴，再說深一層，同樣關注中國家庭祖孫三代之間如何建立或修復親密關係。片中外婆和母親、母親和兒子的關係原本都有創傷，最終得以和解，在於互相之間的溝通，更在於他們最終悅納了自己。片尾有一處鏡頭，是春和在翻看美國作家約翰威廉斯的小說《斯通納》，或因在小說情節映照自身機遇而心有戚戚。斯通納的一生充滿失落與晦暗，在外人眼中是徹頭徹尾的「失敗者」，但他卻勇於直面平凡甚至困窘，活得坦蕩而無愧於心，讓我們在其中望見了普通生命的些微光亮。光亮雖細小，卻足以溫暖人生。